

张炜 写作是乐趣相随的辛苦

文 张杰

小说是绝妙的语言艺术
其他体裁无法取代

问:您如何认知写作这件事?

张炜:一个人的努力工作或者说劳动,是一种乐趣相随的辛苦。在较长较大的工作任务和目标面前,眼睛望过去会感到畏惧,但只要从干起来就好了,诸多困难也会迎刃而解。所以劳动者总是对自己的双手感到满意。他对长期以来的劳动积累下的数量并不敏感,而只对这个过程有更多感受和享受。劳动者的主要收获或馈赠,尽在于此。如果一个人写了40年或更长时间,工作对他意味着什么,大概总会明白一些了。

问:您会看别人写的作品吗?

张炜:我对最好的虚构类文字还是十分着迷的,不过这种作品在书店里很少。不客气地说,大多数虚构都是在胡乱乱造,不属于语言艺术,看它们都是浪费时间。我会更多地去读那些非虚构的作品,看一些有意思的历史人物的一生,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。所谓的非虚构,也是相对的,这些书也不可能没有作者的私货夹带其中。不过总的来说,还是比开门见山说自己虚构的那些文字要可靠一些。虚构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言说,也需要强大的说服力;非虚构的直接言说就更需要说服力。

问:说明您对好小说有一个很高的标准。

张炜:没有比编造糟糕故事更无聊的事了。杰出的虚构故事一定是隐藏了最大的真实,这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另外,这一类绝妙的语言艺术也不是其他体裁所能取代的。可惜这样的杰作很难见到,轻浮草率的编造太多了。如果写出那样廉价的虚构文字,写作者应该感到羞愧。我严格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问:确实现在好的小说越来越少了。

张炜:我认识的一个写作朋友有个聪明的见解,教给我说:一定要多写故事,少写或不写言论。问他为什么?他说,故事是任人评价诠释的,它会在各种解释中变得越来越复杂,越来越神秘,也就越来越有影响;而一旦作家的言论多了,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,人家也就知道了,再也不感兴趣了。

问:那么您认同这种说法吗?

张炜:我没有反驳他,但不想听这种精明的计算,因为文学与思想,即诗与思,好像还不是这样的。那种办法违背了为文的初衷。我不想精明作文,也不想为故事而辛苦,那都是机灵的买卖。我从一开始写作即因为热爱,在场和发言,这才是写作的目的,应该尽力去做。我像讨厌假话一样,讨厌廉价而轻浮的故事。

文学到了杰出的境界
内核都是浪漫主义

问:您说“在场和发言”,是否意味着您想写一部反映当今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?

张炜:从学术上讲,为了把问题说清楚,使用“现实主义”和“浪漫主义”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,这似乎没有问题。但是从作家的体验和实践的角度来看,其实没有什么“现实主义”。仅仅是再现客观现实的文字,不可能是杰出的文学。只要是



张炜

当代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56年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。长篇小说代表作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《艾约堡秘史》《河湾》等。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好的文学,它就是经过了心灵创造的“非现实”,就有变形、夸张,就像飞机起飞的过程一样,先是紧紧地贴着地面,到了一定速度还是要起飞的,要到高处。艺术到了杰出的境界,没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分,都一定是浪漫主义。杰出的文学没有不浪漫的,内核都是浪漫主义的。

问:您的书有时还会以动物为主角。

张炜:有一位诗人朋友对我说,“我总觉得你写动物比写人好,带着那么深厚的爱和情感。”我觉得他对我理解是深刻的,是很大的文学表扬。我爱动物没有私心,它们对我也没有私心。而且我在少年时代,接触的人很少,更多是与动植物在一起,所以我也更理解它们,与它们之间有纯粹的爱。一般的爱,对于文学家、诗人,可能不够用;一般的善,可能也不够用。深刻的悲悯会让它们变得更加浪漫。

问:您一直在研究古代文学,您如何评价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传承,如何理解和看待古人?

张炜:读古人的作品,是一个感动和感慨的过程,只要读进去,就会理解他们。我们对古人应该有更多的理解,但是读到现代人关于他们的文字,我心里常常泛起遗憾。现代人过多地从现在的生活出发去要求他们、理解他们,有时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,比如想让他们反对皇帝,这只是为自己当下的生存考虑,透出自私或天真无知。

古代人的心理及人性与今天的人并无太大不同,他们面对不平、苦难、利益、权利、胁迫、疾病、饥饿等种种情况,作出的反应大致和现在的人一样。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,那就要格外重视了,因为这一定有重要的原因。比如一个古人突然极其勇敢,能够直接痛斥权贵;比如一个人快被处死了还能作出文采丰沛的诗文;比如一口气喝掉无数美酒后还能呼号欢歌。这种种情形都异于常人,所以就需要从头、从深处找出缘由。这些寻找的过程,是认识生活与人、更是认识时代的大路径。

碎片化信息无处不在
很容易消耗宝贵时间

问: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,现在文学不如以前受关注了,在这种外因之下,您动摇过吗?

张炜:怎样对待文学这种好像“可有可无”的事业,这是一个问题。人生多艰,但生活总要继

续,写作也就还在继续。我觉得,尽可能不去浪费光阴,努力坚持诚实和干净的工作,这样度过时间,是对生存的安慰。

问:上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,作为亲历者,能否谈谈您记忆中文学的模样?

张炜:上世纪80年代,不仅是对我个人,对整个文坛来讲,可能都是写作的激越时期,起码回忆起来好像如此。那也是身心有力的、向上的时期,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认真深入的追究。对以往的事情、仿佛事不关己的东西想得很多,很激动。人处于青春岁月容易无私,而无私的精神才会感人。人上了年纪就有身体或其他方面的担心,还有长期以来经验得失的总结,所以就会变得多虑或自私一些。这当然是比较而言。相反的情形也不少见:有人老了,可是越老越公而忘私,能更勇敢地说出一些真话,为公众和社会争利益。这样的老人真是纯洁,是青春永在的人。

问:您觉得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特征有哪些?

张炜:今天的眼光,与百年甚至是十年前大为不同,二者在时间度量上好像不再等值。因为网上大量碎片化的内容、小道消息、各类八卦见闻、各种自我展示,很容易消耗宝贵的时间,让人迷失其中,这是真正的光阴似箭。没有比今天的光阴更值得珍惜的了。人们在每天翻滚而至的海量信息面前未免麻木,麻木也是一种感受状态。当下的写作者,首先要安定下来,仔细想好,让自己归于怎样的一群人和一类。这是个严肃的问题。追随潮流,在流行和习惯中顺流而下,不知不觉就抵达了生命的终点。这样高高兴兴一场,似乎也没什么不好,但我觉得更应该用明晰冷静的眼睛写下这一切,留下自己的劳动果实。

问:现在短视频成了普及度最高的传播载体,实际上在大众眼中文字逐渐被轻视,您认为文字的未来会是什么样?

张炜:文字记下了各种各样的情感、事件、美和丑,让我们感到阵阵惊奇。如果不是因为有文字,我们不知道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上,会有这样坚韧不屈的守望,这么天真烂漫的想象,以及这么多的顽皮。这是人类的精神积累。文字的记录的确是无可取代的,即便发明了视频录像这类方法,文字的力量还是会以强大的特征表现出来。文字伴随了更大的自由,让深沉的灵魂隐匿其中。所以,让人类再选择一次,还是会选择文字。

张炜谈李白杜甫

李白从天空直接降临
杜甫自地面向上攀登

李白和杜甫离我们并不遥远,唐朝离我们并不遥远,甚至和我们一块儿走到了这个网络时代。我们需要对李白和杜甫有新的认识,每个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遇到新的李白、新的杜甫。

李白和杜甫并行在同一个时代,有一段时间还结伴而行,成为有趣的、耐人寻味的一道诗歌风景。纵观一国、一区、一地,最有趣的是常有这一类“双璧”。美国的海明威和福克纳,也多少有点像李白和杜甫。海明威豪情万丈,拳击、豪饮,还到战场去侦察,总是乐于冒险。这个人的可观赏性极强,很外向很有趣,随处留下谈资。但福克纳就有点内向,打扰的人也少。

无论性格还是作品,李白和杜甫的确会找出许多差异,甚至截然相反的东西。所以人们喜欢研究两人之间的“对立”或“差别”,但他们还有大量的共同点值得注意:他们的情感模式、对待友谊的方式,如何对待社会疾苦,特别是对于艺术本身的那种深刻的执着和深不见底的迷恋,还有巨量的、漫长的艺术操练,他们的艺术表达,这些往往既有不同,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、共通的。所以我在《也说李白杜甫》这本书里,重点阐述了他们的“相同”。

李白和杜甫,本质上都是高度的浪漫主义。如果把杜甫强大的浪漫性、幻想性,追求艺术的完美性去掉,我们就理解了杜甫,甚至窄化了杜甫,让他的形象变得单一,只是苦吟的、老迈的形象。实际上他比李白要年轻得多,他的一些代表作也是极度浪漫的,只是杜甫的性格和李白相比显得稍微保守一点,于是就被很多研究者定义为“现实主义”的代表。

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:李白是从天空直接降临,杜甫是自地面向上攀登——攀登到个人的浪漫、幻想、夸张的艺术高度。艺术家的性格、风格、观感可以不一样,但是从艺术的本质来说,他们都是浪漫的。杜甫写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这一类诗,流露出了骨子里的浪漫。在追求完美、浪漫幻想这一点上,杜甫不亚于李白。只是,比起公孙大娘的浪漫,杜甫的风格自有不同。杜甫训练文笔更严谨、更执着、更内向,也更用心。

杜甫写了许多自己看到的民间疾苦,比如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但他也写安逸的生活,比如在杜甫草堂那段时期,他写出了明朗、抒情、欢乐的特质。杜甫是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很敏感的人,无论对人还是对物,都有着超出常人的善良和悲悯。他最好的诗还是他的那些纯粹的诗,抓住了诗歌的核心。

其实所有优秀的文学家,中外古今,无一例外都是如此,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。不是只有强烈触及社会层面的文学才是优秀的文学,文学还有许多其他要素,关键在于文学性,即诗性。

讲述

参观者看了那些艺术品,都不相信是手工雕琢的 在蛋壳上雕琢出锦绣万千

文 赵磊 陈茗

王金义的家就是他的工作室,各类琢画和雕刻作品琳琅满目。今年72岁的他曾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,回首兵团岁月,千钧一发之际,他舍身救下一名患病幼儿,事迹在当地传扬。改革开放后,他下海逐浪,干起了经营制作工艺美术的个体户。因为与达·芬奇“赌气”,闯出了一片新天地,逐步成长为一名工艺美术大师。



王金义

便出门,不管风霜雪雨,不管黑夜白天,不管路途多远多难,只要患者有需要,他都会二话不说,背上药箱骑马出发。后来,他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深夜为牧民看病的场景:“草原的冬天寒冷无比,厚厚的白雪在月光的映照下,一直延伸向冰冷的远方。一个背着药箱的瘦弱身影,跨马奔向西沟,身体在马上起伏伏伏,如同一叶孤舟,飘摇而坚强地前行……”

1973年的一天,牧民家中一名幼儿得了病,情况很严重,王金义束手无策,只能转去兵团卫生院医治。为避免路上出现意外,他决定护送母子二人一起去。

生产队的马车都派出去干活了,只剩一辆牛车,车把式套了三匹马,妈妈抱着孩子,跟王金义一起上了车。马拉着牛车直奔团部,那一带全

是丘陵,土路坑坑洼洼,半路上,牛车的车轱辘不慎挂上了路边的牛粪堆。驾辕的马突然失控狂奔,后面两匹拉车的马也跟着疯跑,牛车“哐当哐当”乱响,简直快要飞起来了。

这牛车本来就快报废了,又经过这一阵剧烈颠簸,几乎要散架,车轱辘断了一根,车把式被甩出老远。王金义大惊失色,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先让孩子脱险!他不顾自己的安危,迅速脱下皮大衣,一把拽过孩子,用大衣裹住,然后瞅准时机,使着巧劲儿,将孩子轻轻扔到地上。孩子平稳着陆,当他回头想救孩子妈妈时,惊马一冲撞上了前面的牛粪堆,瞬间人仰车翻,王金义失去了知觉。

醒来时,王金义发现自己躺在兵团卫生院的病床上,询问身边的医护人员,得知孩子、妈妈、车把式都安然无恙,他才踏实。后来每每回想起当时的场面,他总觉得心有侥幸——那么大的撞击力道,如果孩子没在前一刻及时脱险,后果不堪设想。

王金义的青春留在了内蒙古大草原,他与同为天津知青的张玉英相识、相爱,1978年,这对恋人双双返城工作,并喜结连理。王金义分到一家工厂的保健站,但出人意料的是,这位一心治病救人的“小王大夫”并没有把从医之路进行到底,而是开启了另一

段人生,走上了完全不搭界的工艺美术之路,创造了一门被他称为“琢画”的雕刻技艺。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,他做这件事是跟一个人赌气,那个人竟是达·芬奇!

研读艺术理论和理论书籍
折服于达·芬奇的绘画观念

改革开放初期,王金义大胆抉择,辞职下海,不过,他既没有摆摊卖服装,也没有开餐饮开饭馆,而是一头扎进了工艺美术的海洋。“从小喜欢画画,小学二年级时在学校里画黑板报,大家都夸我画得不错,可以说有那么一点小天赋。后来去了建设兵团,业余时间我也没撂下画笔。辞职后一开始做石膏像,在百货大楼旁边的工艺美术大厦里面售卖。那阵儿有文化的家庭喜欢摆这些东西,显得高雅,学美术的孩子画素描也得上。不过石膏像制作晾晒的过程中损坏率太高了,也就是勉强勉强地干,小打小闹,挣得也不多。”王金义说。

他不满足于此,平常有时间就搞点雕塑创作,想开拓一下领域。有一天,上大学的女儿带回家一本达·芬奇谈绘画理论的书。王金义在书里看到一句话,大意是说,雕塑不可能实现油画那种立体的效果,油画能造就一种瞬间的真实感,但雕塑永远不可能。他感到不解:“满手是泥,满头臭汗,结果还没有立体感?”

王金义对这种“抬高绘画贬低雕塑”的论调极不屑,他跑遍了天津市各大书店和图书馆,非想找出不同观点,推翻达·芬奇的论断。天津市图书馆的资料最多,他在普通借阅室找了个遍,没看到想要的內容,便向工作人员求助,说想要关于世界美术

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资料。那位工作人员特别负责,把王金义带到库房,让他按照分类自己找。

王金义在各类艺术史料、理论书籍里穿行游走,认认真真地研究,逐渐对雕塑和绘画有了新的认知——绘画是从简单的线条到多种色彩的叠加,雕塑则是把各种原材料,通过削、刮、凿、挖,做减法,完成一件艺术品。他从赌气到服气,“不管雕塑的作品是动物也好,人也好,原材料什么颜色,出来就是什么颜色;而绘画的色彩却千变万化,所以我也深深折服于达·芬奇的绘画观念,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人超越他。”达·芬奇的理论也成为王金义进步的阶梯。

灵感的花火往往就在一瞬间出现。有一次家里吃涮羊肉,最后发现铜锅里有一大块木炭没烧透,王金义把木炭夹出来拿水浇灭,木炭裂成两半,从外到里颜色却不一样,黑色、棕色、浅棕色,然后是黄色,最里面是木头的本色。王金义豁然开朗:“木头里面有过渡色,那么我也可以利用这种色彩,雕刻出带颜色的艺术作品!”他找来一块两厘米厚的木板,先用火烤,再用蜡烛烧,又用喷灯熏,木头的表面被烧得黑乎乎的。他把黑色的部分一点点刻下去,露出暗红色,再往下刻,高光的地方露出原木色,刻成了一幅清晨霞光的图画,拿给别人看,都说他“画得不错”。

独创“琢画”雕刻技法
蛋壳艺术名扬海内外

经过反复摸索,王金义终于以减法的雕刻实现了达·芬奇认为只能在绘画中呈现的“瞬间真实立体感”。选择的材料也多种多样,木材、石材、蛋壳,只要将原材料本身的色彩运用好,或人为制造出色彩,一切皆有可能。

他的第一件蛋壳作品《梅花》创作于1992年,在薄薄的蛋壳上分多层次雕琢,利用蛋壳由表及里的自然色彩变化,呈现出一种美的意境。他用鸡蛋壳雕刻出人民币背面的图案,如长江三峡夔门、桂林漓江、黄河壶口瀑布等,锦绣山河尽收眼底,立体感极强。有一次展览,他告诉参观者这是他刻的,人家根本不信,非得说是电脑打印、化学腐蚀的。

王金义把自己的创新雕刻技法定名为“琢画”,这“独门秘籍”名扬海内外。他多次出国进行文化交流,所到之处,他的作品和现场表演无不让外国朋友拍手叫绝,赞叹其巧夺天工的艺术技法。

一位澳大利亚女士见到王金义的琢画作品后赞叹不已,她说澳洲鸵鸟鹌鹑蛋是世界第二大鸟,鹌鹑蛋珍稀、古朴,建议王金义用鹌鹑蛋搞创作。王金义动了心,等了五年,机会来了,澳大利亚友人杰西卡送给他五只鹌鹑蛋。

鹌鹑蛋高约15厘米,宽约10厘米,表面呈墨绿色,布满小孔,坑洼不平。究竟该刻些什么呢?鹌鹑象征父爱亲情,经过慎重考虑,王金义决定以孔子为主题,找来过去的木版刻本,确定了“子贡辞行”“克己复礼”等几段孔子与弟子的故事,在鹌鹑蛋壳上精心雕琢。墨绿色的蛋壳随着刻线的深入逐渐显露出蛋青色,蛋壳本身的色差与灵动的线条呼应,作品栩栩如生,极为传神。

从官员到民间艺术家,王金义自认为得益于他骨子里认真钻研的精神和永不屈服的精神。退休后,他经常拿出珍藏的作品在社区展览,供居民观赏,并教社区的孩子们画荷花、竹子、兰花,进行美育教育。2023年是王金义“光荣在党50年”,他完成了卵石雕刻作品《共产党人赋》《入党誓词》《为人民服务》。重温入党誓词的那一刻,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。